

KAFKA DICTATES

卡夫卡口述



〔奥〕卡夫卡 口述 〔捷〕雅诺施 记录
赵登荣 译



上海三联书店

KAFKA DICTATES

卡夫卡口述

〔奥〕卡夫卡 口述 〔捷〕雅诺施 记录
赵登荣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卡口述 / [奥] 卡夫卡口述; [捷] 雅诺施记录; 赵登荣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3

ISBN 978-7-5426-2991-3

I. 卡... II. ①卡...②雅...③赵... III. 卡夫卡, F.
(1883 ~ 1924) — 回忆录 IV.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2659号

卡夫卡口述

著 者 / [奥] 卡夫卡 [捷] 雅诺施

译 者 / 赵登荣

责任编辑 / 戴俊 叶庆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150千字

印 张 / 13.5

ISBN 978-7-5426-2991-3 / I · 416

定 价: 19.80元

译 本 序

叶廷芳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三十多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今天，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就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

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

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于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产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与歌德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作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是开启未来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吸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

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①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本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②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作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作出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作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他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得最多的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

① 这是德国著名文艺评论家汉斯·迈耶尔1979年在北京大学讲演时的论断。

② 奥登：《卡夫卡问题·K·的寻求》，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6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的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对于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当然，卡夫卡“谈话录”能不能像《歌德谈话录》那样保持不朽的恒定值，这主要看书中的价值容量。卡夫卡在这本“谈话录”中涉及到十分广泛的问题，政治、哲学、文学、美学、宗教、伦理等无所不包，而且每每有精辟的见解。例如人们经常引用以说明他的基本政治观点的那句话“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①就是出自这本书，而卡夫卡的这一思想与他在长篇小说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以及卡夫卡的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富克斯指出的“卡夫卡是个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论断是一致的。又如，卡夫卡是写“异化”出名的，但他的小说和书信、日记中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哲学意义上的“异化”这个概念，而他在“谈话录”中有些表达却是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生活的传送带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②在另处他谈到人被群体运动所左右而使自己的意志失灵的

① 《卡夫卡谈话录》第149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1年。

② 同上书，第132页。

情况，^①等等。再如，卡夫卡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是以表现方法的奇特著称的。这一现象根源于他独特的美学思想，而这方面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见解，大多见之于这本书中，如他认为“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②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在于设法“给别人装上另一种眼睛”。^③这就是艺术应帮助人们透过生活的表象去发现的真实本质，而“照相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表层”。这里的“照相”就是“写实”的同义词，他认为按照生活表面去写实，是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真实的。因此在他看来，“电影是铁制的百叶窗。”^④这就是说，实录的作品是妨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于是他提出：“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这就为他作品中那种象征性、譬喻性的写法提供了注脚。卡夫卡的最大传奇故事之一当推他晚年的焚稿奇念，通过这本“谈话录”我们可以窥察到他的这一念头的内心秘密。像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卡夫卡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书中他赞赏“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清、纯、真”，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⑤他着迷于中国古代成语、譬喻、幽默故事；^⑥他赞赏《道德经》、《南华经》，尤其被老子思想所“陶醉”，他以拥有《论语》、《中庸》、《列子》等书籍为自豪，认为“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⑦等等书中还有一系列格言式的警句，

① 《卡夫卡谈话录》第143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1年。

② 同上书，第117页。

③ 同上书，第159页。

④ 同上书，第178页。

⑤ 同上书，第191页。

⑥ 同上书，第171页。

⑦ 同上书，第171页。

这里就无法一一尽述了。当然由于卡夫卡思维的悖论习惯，他的有些见解不大好理解，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就总体而言，书中的许多见解都是颇具新鲜感的。

卡夫卡“谈话录”是根据追忆记述的，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如何呢？二次大战以后，1947年，本书记述者雅诺施曾将手稿送给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过目，勃罗德阅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了内容的可靠性，并在尔后为卡夫卡写的传记里作了详尽的记叙，他写道：

“卡夫卡的外部特征，他的讲话方式，他的特别富有表达性的、习惯于借助手势的柔和方式，以及类似于音容笑貌那样的东西，得到了最鲜明的再现。我觉得，仿佛我的朋友突然又醒过来了，并正走进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讲话，见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安详地看着我，感觉到他那静谧的、痛苦的微笑，我感到被他的智慧攫住并受到感动。”^①

在另一处勃罗德继续写道：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②勃罗德还利用卡夫卡晚年的生活伴侣多拉·迪曼特听他朗读后的反应来验证他的判断。他说：“她立即被吸引住了，并认出这是卡夫卡的那确凿无误的风格和他的一切通过雅诺施所保留下来的思维方式。她感到这本书是她与卡夫卡的真切的重逢并引起心灵震撼。”^③无疑，这本书将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样，不仅成为卡夫卡本人思想、人格和创作的“文

① M·勃罗德：《论卡夫卡》第188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77年。

② 同上书，第190页。

③ 同上书，第188页。

献和见证”，而且也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献和见证。

作为卡夫卡的研究者，笔者深知这本书的价值，一直想让它早日在我国问世，并打算亲自将它翻译出来，只因诸事缠身迟迟未能开笔。为避免继续延搁，笔者特约昔日大学同窗赵登荣教授来完成此项任务。承蒙赵兄鼎力相助，在百忙中奋力于指定时间内圆满完成。译者素来治学严谨，汉、德兼优，理解准确，译笔流畅，为我辈中的优秀译者之一，相信会受到读者欢迎。希望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对一般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德语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有所助益。

1991年2月

本书的历史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对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又名《卡夫卡口述》）。读者、报纸与广播电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

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

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漩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对我来说，弗兰茨·卡夫卡是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因为离我们最近——人类信仰与思想的宣告者之一。

在我和他相处的年月里就已经风烛残年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唤醒了我的感情和思想。他是精神上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也是对我青年时代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一个真正的、为真理和人生价值而苦斗苦争的人，我目睹了他为生存所进行的顽强斗争。他的脸部表情，他的轻声话语和大声咳嗽，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和那双纤手的优美动作，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中的忧郁和光彩，他常用这双眼睛的光芒强调他的看法，他的人格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因而永不再现的东西，他的外在的与内在的气质，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里颤抖，像在我的岁月的各种通道和峡谷里回荡的回声，不断地以清晰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这种回声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清晰。

我的卡夫卡博士不是我们时代文字记载中迟早要失去光辉的形象，而是始终活着的、起着典范作用的人，是一束光，它的温暖和不断增强的光亮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像指引我保持善良和真正的人性的可靠的指南针那样，忠实地陪伴着我来到迅速临近的死亡的门槛。

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经历，是一种又甜又涩的、调动我的所有生存力量的震动，是生长脊椎。我在与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相处的日子里，主要通过认真记日记的方法设法促进它的生长。我首先记下他的言论。至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则概略做了记载。我觉得这些情况不重要。我只看“我的”卡夫卡博士。他是思想焰火，其他的一切都在它的影子里消失。这当然也影响我的记载的语言和形式，这种影响在我的日记里不像在专门记录里那样大，我把那些专门记录记载在我看作我的经常性的“思想库”的厚厚的灰色记录本里。

在这个本子里，我非常杂乱地储存了引语、诗歌、小块剪报、文学计划和奇思妙想、轶事、小故事，我一时想到的事情以及从三教九流那里听来的事情，首先是卡夫卡对各种不同的事情和事件的议论。您可以从这个思想库里取材，编出一本可观的惊人的格言集。但是，把相关的文字机械地收集在一起，并不能编就这样一本集子，因为我常常把这些不同警句的出处和如何产生的材料略而不记。今天看来，我的“思想库”只是零星地、随便地记录下来的各种阅读和对话时的片断材料的大杂烩，我也许只在记录的当时才确切知道这些材料产生的背景情况。

这一点，我在弗兰茨·卡夫卡逝世后两年就清楚，当时我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的斯塔拉里斯市捷克正统天主教徒、政论家和出版商约瑟夫·弗洛里昂家逗留了几天，和他及在他的家庭集体中生活的弗拉那神甫讨论弗兰茨·卡夫卡和现代文化的各种发展可能，我们整整讨论了几个下午和晚上。

应弗洛里昂的要求，我从日记和“思想库”的毫无文学色彩的记载中编了一本语言上大家都能懂的言论集，约瑟夫·弗洛里昂想用捷克文出版这个集子。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我的感情与思想和弗洛里昂的正教思想无法取得一致。于是我就只好离开了。我开始了在不同的人、城市、价值观和职业之间不安地进行摸索的漫长时期。在这过程中，无数新的体验冲刷了我青年时期的感情与思想经历。卡夫卡博士的图像苍白淡漠了。我离开了我青年时代的精神上的根本经历，因而也就离开了我自己，离开了只保留给我一个人的、发展我独特的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就像那些写得很工整的回忆和记录，连同那本厚厚的灰色“思想库”笔记本，放在我的书柜里旧的乐谱、乐曲初稿、图画和剪报下面“闲居”那样，我与卡夫卡博士相处的日子留下的情景和话语，也沉没在对幸福和生活真谛的各种杂乱无章的错误的想象中。后来，在战争和暴

力的高压下，我才开始清理我的思想。《变形记》中的昆虫生活和《在流放地》中的冷酷无情的行刑机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装订工当时在我的卡夫卡早期小说集上绘制的燃烧的荆棘丛，“我的”卡夫卡博士多年以前试图只把它看作必须摈弃的夜魔的世界观和信仰浮现在我的脑际，弗兰茨·卡夫卡的地狱突然变成我的日常体验的普通的组成部分。

我曾与我的朋友、著名的布拉格音乐家格奥尔格·瓦霍弗斯及他的妻子雅娜谈论强烈地触动我的心灵的世界气氛的转变。他们认为，我对弗兰茨·卡夫卡的回忆不属于我一个人。

“一个人从酸甜苦辣的经历中榨出的经验之酒是属于大家的，”雅娜说，“因此应该用语言的盘子把酒传递给大家。”

我的朋友也赞同她的看法。他说：“你一定得把这些谈话整理出版。你是卡夫卡的见证人，你也许掌握着理解他的内心本质的重要钥匙。”

听了他们的话，我回答道，我不了解他的全部作品；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诗人与他来往，而只是把他当作我父亲的同事。对此回答，我朋友的妻子却火冒三丈。她一边在空中挥舞双手，一边嚷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对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作品要求一个人全身心地投进去。这一点在你们的谈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法学博士卡夫卡和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之间并没有把他们分割开的隔音水泥墙。这一点，在他和你进行的谈话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出来。你和他的谈话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因此，你不能把这些谈话据为己有，不公之于众。”

对此，我无言以对。

我从柜子里取出我的记录，交给我朋友的妻子打字誊清，因为当时（1947年）我在臭名昭著的布拉格潘克拉克监狱无端地受了十四个月监禁之后，精神受了打击，身体十分虚弱。

约哈娜·瓦霍弗斯^①没有花几天时间，就一式三份打完了我的稿子，并作了注释。她没有问我一声，就于1947年3月21日通过布拉格邮政总局把稿子寄往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马克斯·勃罗德。然而过了几星期后，我朋友的妻子没有得到回音，心中十分不安，她又把一份复写稿寄往斯德哥尔摩她的伯父埃米尔·科萨克，一位印刷专家那儿。从斯德哥尔摩那儿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书提供给属于玛丽·S·罗森贝格夫人的一家犹太小书社，罗森贝格夫人住在纽约西100区72街。她很快复了信，并于1947年9月10日来到布拉格，从国家手里买了大批被没收的德语旧书运回美国。对我的书稿《卡夫卡对我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只表示了礼节性的兴趣。但对我这样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受了百般折磨的拘留犯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别的人对我的信都不做答复。我抱着一丝出版的希望，把最后一份打字稿给了罗森贝格夫人，而没有向她要收条，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份稿子。

雅娜·瓦霍弗斯把我的回忆录称为卡夫卡资料集，现在这本资料集无声无息了。我试图把我的回忆录当作一次失败的、因而毫无意义的文字尝试忘掉它。然而到了1949年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封落款日期为1947年12月14日的信，信是卡夫卡的忠实朋友和知己马克斯·勃罗德寄来的，他在信里谈了对我的稿子的看法。他指出了注释中的几个小错误，在总体上则把我的书称做一本“很好的、很有启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书”，他将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奔走。

他在信的结尾说：“最后，我要再次对您说，您的记录使我感到很高兴，它使我难忘的朋友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中一部分增加了新的细节——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令人十分感动。

① 即雅娜。——译者